

英国公民课改革的政治学理论基础 和意识形态背景研究

陈琳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 英国教育部在2002年颁布法案,把公民课纳入中学必修课,并于2014年修订课程指导意见。英国国内围绕课改的学术讨论,以政治冲突调解、政治参与平等这两项内容为核心的政治学理论对推动公民课法定化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而课改也受到了社会资本理论的支持。同时,英国公民课是社会主义、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等多个意识形态的混合体,这一多元特征既为课程法定化提供了现实条件,也为其实施带来了挑战。

[关键词] 英国;公民课;政治学理论基础;意识形态背景

[中图分类号] G417/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469(2019)07-0108-11

2002年,公民课被纳入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中学必修课目录;2014年,英国教育部对公民课指导意见作出修订。英国公民课改革引起了我国学界的浓厚兴趣。现有研究清晰呈现了其历程和困境,并特别强调了伯纳德·科瑞克(Bernard Crick)教授在推动这一改革中的重要作用。^[1]

本文尝试从政治学理论基础和意识形态背景角度梳理围绕英国公民课的讨论,包括:详细介绍科瑞克教授的政治学理论架构,及其对民主社会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意识形态认同,阐释这些因素在推动英国公民课课程改革和形塑课程方案中的作用;揭示对英国公民课改革产生重要影响的其他政治学理论和意识形态,如社会资本理论、保守主义和社群主义,指出课程设计是多方辩论和妥协的产物,且面临持续的争议和改革压力。

[基金项目] 2018年教育部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研究——概论课教学的视角”(项目编号:18JD-SZK12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国外价值观教育的体系化运行与可借鉴性研究”(项目编号:16AZD035);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当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研究项目“国外左翼思潮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项目编号:18ZGH006)。

[作者简介] 陈琳,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一、“政治”与“政治教育”:英国公民课改革的政治学理论基础

英国公民课改革的学术讨论主要来自于其国内政治学界。相关学者普遍认为,公民课课改的理论基础是对人类政治生活及教育在其中所应承担责任的^[1]理解,该问题的争议性决定了课改的争议性。要对围绕公民课的复杂争议予以清理,就必须从政治学理论根源上对“何为政治、何为教育”给出明晰界定;要赋予公民课以法定地位(Statutory Status),就必须对政治教育(Political Education)及其合法性进行充分论证。

也正是因为此,公民课课改在英国国内催生了一系列以“政治教育”为主题的学术成果,甚至可以说,“政治教育”已成为英国政治学界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一大热门研究话题:仅以在题目中包含“政治教育”为标准,据笔者于2016-2017年间在牛津大学访学期间利用其图书馆馆藏资源所做的不完全统计,这些成果包括近20部学术专著和近10部论文集;《牛津教育评论》(*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还于1999年以“政治教育”为主题专门组织专刊,而笔者还在牛津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库中发现了《托马斯·霍布斯哲学理论中的政治教育》(*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Philosophy of Thomas Hobbes*)等从具体政治哲学代表人物角度深入分析政治教育的论文选题。同时,在实践界,工党出版了多个以“政治教育”为题的宣传手册,甚至教会的工作手册都以“政治教育”为题。从这些资料都足见当时英国国内围绕“政治教育”的讨论热度。在这个讨论过程中,政治学者科瑞克教授的政治学理论起到了推动和整合讨论的关键作用。他任主席的政治学协会(The Political Association)在1969年成立后就积极参与和推动相关讨论,他领衔的咨询报告《公民与民主教育》(*Education for Citizenship and the Teaching of Democracy in Schools*)更常被简称为《科瑞克报告》(*The Crick Report*),^[2]标志着英国理论和实践界对公民课法定化从消极反对到积极支持的转折,并成为2002年课程法定指导意见的直接文本来源。

科瑞克把其政治学理论的来源主要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不同于柏拉图在《理想国》(*The Republic*)中所阐释的高度一体化的政治架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政治学》(*Politics*)中指出,政治生活好比由冲突性音符和节奏所构成的旋律。^[3]科瑞克则认为,政治是“调解差异性利益并在其间分享权力的活动”^[4],政治学旨在“研究对社会整体产生影响的价值、利益冲突及其调解”^[5],政治秩序是“能够在不可消除的价值和利益冲突之间达成温和妥协的体系”。^[6]在1978年出版的关于英国政治教育的首个专门系统性研究报告中,“政治”被界定为“创造性调解利益或道德争议的行为”^[7],与科瑞克的理论高度一致。确实,对“政治”的这一界定有力回应了保守主义对政治教育的质疑,而后者则是导致政治教育在英国长期缺失的重要原因之一。下文从政治冲突和政治平等这两个角度对此进行阐释。

(一)政治教育的正当性来源之一:政治冲突与政治调解

科瑞克的政治学理论的最鲜明特征在于其对政治冲突的态度。包括:其一,以利

益和价值的多元性和冲突性为政治活动的起点和终点,认为共识、共同善和共同意志就存在于政治调解(Political Conciliation)的具体行为之中,而不是外生于政治过程的抽象前提或结果;其二,区分“基于共同善的冲突调解”和“基于个体或团体意志的权力斗争”,把政治限定于前者,并把其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表征,认为混淆政治行为和权利斗争是导致“政治”被污名化的原因。该理论要点直接为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和内容设计提供了支持:

首先,由于政治生活的核心要义在于对利益和观念的冲突的调解,所以,使参与者获得相关知识和技能对政治运行至关重要,而这正是政治教育的内容。科瑞克的这一论证其实集合了当时多位政治教育支持者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对政治教育重要性的强调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中把政治教育看作提高公共生活质量的核心方法,以及立法者的首要职责。但是,近代以来,由于纳粹德国和前苏联借助暴力权威所进行的灌输式教育实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政治教育”在英文语境中所引起的联想急速负面化。^[8]在英国围绕公民课课改的讨论成为热点之前的1951年,在就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系系主任之际,迈克尔·奥卡肖特(Michael Oakeshott)就已直接把他就职演说命名为“政治教育”,并在开篇就指出,“政治教育”在当代已沦为了一个“邪恶”的词汇,这是现代语言“堕落腐化”的结果,也是战后英国政治生活乱象丛生的原因。^[9]1967年4月,《卫报》(*The Guardian*)刊登了时任布莱顿教育学院历史学系系主任的德里克·希特(Derek Heater)教授的编辑来信,呼吁“为政治教育正名”;1977年11月,《泰晤士报》(*The Times*)也专设增刊,呼吁“在英国重建政治教育”,把政治理论界围绕“政治教育”的争论推到了大众媒体中。

其次,由于观念和利益冲突是人类政治生活不可消除的永恒主题,所以政治议题与价值判断的紧密联系,以及与之相伴的争议性都不足以构成反对政治教育的原因。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一些保守主义者就以此为由、认为政治教育应该被排除在学校课表之外——政治活动涉及价值判断和行动方案,具有高度主观性,而学校教育的目标应是培养学生们热爱客观真理的情感和进行理性思辨的能力。^[10]1934年,一些自由主义者和费边主义者组织成立公民教育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Citizenship in Britain),首次明确提出在英国进行公民教育,但由于政府中保守主义者的反对而无疾而终。1944年,由该协会所引发的讨论形成了两份专题报告,但它们都对政治教育作出了负面评判:前者认为学龄期儿童和青少年不适合接受有关现实政治生活的教育^[11],后者认为政治生活不适宜作为直接和独立的教育内容,而应该被纳入历史、地理、语言等其他科目的教学中。^[12]同年颁布的教育法案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提到了公民教育,但却被放在“永不能被实施的内容条目”中。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讨论中,曾任中学校长和英国教育部长的罗德斯·博伊森(Rhodes Boyson)在《泰晤士报》上发文明确反对政治教育,直言“除了学习政治之外,生活还有更为丰富的内容”。虽然支持政治教育的声音在这一轮讨论里也赢得了不少认可和同情,但是随着以撒切尔为首的保守党的掌权,围绕政治教育的讨论再次陷入沉寂。据科瑞克回忆,当新

上任的新工党首任教育处秘书大卫·布朗克特(David Blunkett)于1997年任命他为课改咨询委员会主席的时候,他以为“围绕政治教育的事务已经完结”、而且“已经开始忙于其他事务了”。^[13]即使在2002年获得法定地位之后,英国议会依然有每年两次左右的围绕公民课的辩论,保守主义者依然会从政治议题敏感性和争议性角度对课程提出质疑,足见这一思想对英国公民课课改的影响。

最后,不同于诉诸暴力和欺骗等的权力斗争,政治调解活动主要借助于公共讨论展开,且冲突的永远在场意味着不能期待通过对话得出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所以,政治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参与公共讨论的热情和能力,而且其本身就是公共讨论展开的重要场景、是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围绕英国公民课课改的理论争论中,不少学者都对此进行了阐释。哈罗德·恩特威斯尔(Harold Entwistle)指出,以“追求真理”为目标的政治教育是危险的,可能把政治行为降为肮脏的权力游戏。^[14]彼得·奥本(Peter Euben)认为,政治教育要引导学生同时认识到情感和理性对于公共讨论的作用,并在政治教育的过程中通过言语和对话来培育学生的政治美德。^[15]罗伯特·布朗希尔(Robert Bronnhill)和帕特里夏·斯马特(Patricia Smart)指出,政治教育应帮助学生识别自己和他人参与公共讨论时所具有的隐性的知识背景和解释框架,知道政治讨论不同于单纯诉诸理性逻辑的学术讨论、具有鲜明的价值性和行为导向性,但是同时也尽量排除盲目偏见、情感和狭隘利益的影响,最大限度在语言互动中实现理解和妥协、避免暴力。^[16]迈克尔·沃尔兹(Michael Walzer)认为,政治教育不是让孩子们具备在未来做出恰当政治决策的能力,而是要让他们进入到持续一生的政治参与过程中,政治决策的关键不是单纯的成本—收益计算或绝对的道德判断,而是“意识到政治决策的困难所在、并不断为决策的正当性感到忧虑”,进而在这个开放的过程中不断修正决策原则、培养政治共同体意识。^[17]迈克尔·奥卡肖特(Michael Oakeshott)也指出,由于政治活动以一定的知识和教育为前提,所以政治教育必然内在于政治活动之中——政治教育和政治活动的关系就像孩子学习语言和参与言说的关系。^[18]这就进一步回应了保守主义者对政治教育的质疑:除了政治议题的争议性之外,保守主义反对政治教育的另一个核心原因是担心“政治教育”蜕变为“政治化的教育”,也即纯粹的灌输和宣教,进而侵犯个人自由;而在上述理论中,学会识别和应对潜在的分析框架、偏见利益和冲突所在恰恰是政治教育的核心目标;而且,给定政治生活的争议性,相较于把价值内涵于课程体系内的隐性价值引导,对价值的公开、直接讨论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参与政治生活、真正实现自由的能力;或者说,明确而开放的政治教育恰恰是尊重学生个体性和自主性、进而克服被动灌输的最佳方式。

(二)政治教育的正当性来源之二:政治平等与政治参与

如果说政治冲突及其调解是科瑞克的显性特征的话,那么,政治平等和政治参与则是其政治学理论的隐性内涵。体现在:其一,利益和价值冲突中的所有参与方没有先于政治生活的前定等级之分;其二,体现共同善的政治调解要求所有相关者的充分有效参与。这是英国政治学界支持和设计政治教育的另一个理论支柱。

强调自然等级、担忧过度平等导致低质量政治参与的保守主义在英国影响深远。早在1807年围绕贫困儿童教育法案的讨论中,托利派就明确反对为穷人家庭的孩子提供教育,认为这会带来过度的平等情绪、进而危害英国的政治传统;1870年,基于提高国家工业实力的考虑,普及基础教育的提案获得了通过,但是提案颇为强调的另一个核心理由——政治教育——并没有引起任何重视。^[19]确实,在保守主义者看来,对大众进行政治教育既是不可行的、也是不可取的,因为政治活动不仅要求参与者具有相应的狭义知识,更需要复杂的理性、美德和行动力,而这些品性和能力对个体的先天禀赋具有很高要求、也很难通过学校里一般的教育学习方式获得。

然而,在政治教育的支持者们看来,政治权利的平等具有内在价值,自然个体的先天禀赋不存在根本差异,和其他人类活动一样,政治活动可以、也必须通过适当的教育和学习过程来习得。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近代英国对政治教育的提倡是和选举权的扩大齐头并进的。例如,1879年,亨利·索利(Henry Solly)在《政党政治和政治教育》(*Party Politics and Political Education*)一书中指出,正在兴起的政党政治需要配之以对工人劳动者的政治教育、也为其提供了可能;^[20]1882年,乔治·怀尔(George Whale)在伦敦郊区和剑桥大学发表以“政治教育随想”为题的演讲,明确指出我们应该做的不是基于人们的自然禀赋和等级出身来限制其权利的平等,而基于权利平等来提高人们的能力,而他撰文和演讲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明确政治教育的形式和内容(他定为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来回应爱德蒙·伯克等保守主义者对于政治教育不可行的质疑。^[21]更近期的,埃蒙·卡伦(Eamonn Callan)也指出,政治教育是一种价值选择,在实践中无法保证其成功,但依然值得一试。^[22]

随着选举权的不断普及,政治教育的支持者们进一步指出,即使不认可平等的内在价值,即使深知政治教育的困难和失败的可能,近现代民主政治也迫使我们不得不去努力寻求有效的政治教育方式——如果说传统政治体制只要求对少数人(君主、贵族、政府官员等)进行政治教育的话,那么,在当代社会,我们则不得不对所有人进行政治教育;而且,和传统统治者所接受的政治教育相比,当代政治生活的参与者所能得到的政治教育的质量可能太低了。早在1848年,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就指出,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普通民众能在多大程度上习得“理性”,他认为这一演进已在自然发生,政治教育则可以加速该进程。21世纪初,在回顾了自古希腊开始的英文语境下的“民主”传统后,科瑞克得出了“政治权利的平等必须伴之以平等和有效的政治教育”这一结论。在他看来,政治教育既是克服民主困境的唯一出路,也是通向政治平等的唯一可行途径。^[23]

二、从“政治教育”到“公民课”:英国公民课改革的意识形态背景

科瑞克对“何为政治”的上述理解直接塑造了其对“政治教育”的倡导和设想。这也清晰体现在公民课的方案中。2002年课程指导意见直接承袭《科瑞克报告》(*The*

Crick Report)的内容设计,包括三个部分:政治素养、社会与道德责任和社区参与;其中,政治素养指“关于政治概念和政治过程的知识、以及政治参与的技能和意愿”。显见,该设计直接承载了政治教育的精神。但是,在2002年进入中学法定课程目录的科目并不以“政治教育”命名,在公民课的内容中,除政治素养外还有两项内容:社会与道德责任,以及社区参与。课程名称的变化和课程内容的扩充以围绕课改的意识形态争论为背景。这一部分对此予以阐释。

(一)英国公民课改革的意识形态背景之一:民主社会主义

科瑞克的意识形态认同首先是英式的民主社会主义。他是1997年工党掌权后首任教育部长布朗克特(Blanket)的大学老师,在1988年曾撰写《社会主义》(*Socialism*)等宣传小册子,^[24]认为工党连续的竞选失利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舆论中的不利地位有关,而这个册子即意在澄清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进而重塑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科瑞克对“英式社会主义”的界定和其对“政治教育”的定位之间具有紧密联系。

其一,科瑞克认为,基于社会主义的历史教训,需要对“平等”的含义进行清理,而他的结论是:在人类社会的现阶段,从任何确切角度(财富、地位、或者机会)来要求人与人之间的绝对平等都是不可行的、也是不可取的,平等只能体现为一种“文化”。所以,他也把英式社会主义称为文化(伦理)社会主义。这种“平等文化”的核心要义在于最大限度地从社会制度角度来解释和弥补人与人之间能力的差异,而教育则是与此有关的最关键制度。基于此,认可政治平等的价值、进而对所有人提供平等而有效的政治教育也就是题中之意了。

其二,科瑞克认为,从现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是一个长期过程:如果说平等的真正实现是中长期目标的话,在短期则还是要在现有制度框架内争取利益的平等、寻求温和的制度演变。这就要求参与者掌握有关英国现行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知识、并具有政治参与的技能和主观意愿,而这正是“政治素养”的核心内容。而且,政治教育的作用不仅是向民众提供获得政治素养的平等机会,更重要地,它还是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核心动力机制——通过影响学生们的价值观,政治教育将推动从等级文化向平等文化的转变。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教育已经被看作了一种“非暴力的社会变革方式”。

(二)英国公民课改革的意识形态背景之二:共和主义

科瑞克晚年的意识形态认同还具有浓厚的共和主义色彩。这一转变对其在1997年担任英国公民课课改咨询小组主席后的观点和行为有很大影响。具体体现在:

其一,据科瑞克回忆,随着世界政治局势的变化,他开始反思《为政治辩护》(*In Defense for Politics*)一书仅从“冲突调解和公共讨论”角度对“政治”的界定,认为自己年轻时候受到了冷战中两大阵营简单对立思维的影响,高估了在“自由辩论”中达成妥协和培育美德的可能,开始认同通过其他方式进行品格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25],而当时正在复兴的共和主义显然对他的思考产生了影响。这集中体现在科瑞克去世

后才被整理出版的《积极公民: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和如何达成这一目标》(*Active Citizenship: What Could It Achieve and How?*)一书里,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到,晚年的科瑞克转向了“公民共和主义”——该书第一章即科瑞克撰写的《公民共和主义和公民:今日的挑战》(*Civic Republicanism and Citizenship: the Challenge for Today*)一文,他在该文中提供了不同于欧美主流自由主义传统的对公民理论的历史阐释,并倡导在英国构建“公民文化”。^[26]进一步看,虽然当代政治学理论对于古典共和作家及其文本具有不同的解读,但是对“公民美德”和“积极参与”的重视是各种阐释的共同特征。^[27]所以,对共和主义的转向导致科瑞克愿意和更为强调道德教育的保守主义者,以及更为强调社区参与的社群主义者合作,能够接受“公民课”的名称,并同意在其方案中放入“社会和道德责任”和“社区参与”这两项内容。

其二,对于古典共和文本的现代解读主要有两个分支:公民人文主义(Civic Humanism)和公民共和主义(Civic Republicanism),其中,前者把公民美德和参与作为具有应然性的价值本身、并且一定程度上不反对由于个体先天禀赋差异所导致的后天不平等,而后者则把公民美德和参与看作实现良善制度的工具、并且强调后天教育在帮助个体实现美德和有效参与中所应该具有的作用。^[28]正因为此,构建公民教育和培育公共精神就成了公民共和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29]科瑞克晚年的思想与此高度一致。虽然他开始认同个人品格作为良好政治生活前提的重要性,但是,在个人美德和政治参与之间,他不仅更为强调政治参与、而且还特别强调政治参与的核心目标在于构建更为完善的社会制度。这集中体现在2007年(科瑞克去世前一年)发表的《政治民主和公民教育》(*Political Democracy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一文中。在该文中,他明确表示自己所说的“政治教育”的实质是“民主教育”(之前只是因为民主一词的含义“过于混乱”而未采用该说法),而且,虽然他同意在公民课中放入品格教育和社区参与,但是他的核心意图依然是培育具有参与政治变革的意愿和能力的“积极公民”,而非仅仅具有良好个人品性的“好公民”。他在文中还专门对此举例说明:公民课不应该仅仅让孩子们出于“善良美德”而“志愿参与”养老院活动,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孩子们对现有养老制度进行反思、批判和推动其渐进改良的能力和意愿。他甚至在文章中开玩笑说,虽然咨询报告开宗明义——“我们的目标是在全国和地方两个层面改变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是要向年轻人传递现有公共生活中最有价值的传统,并让他们具备构建新的社会参与和行为方式的自信、能力和意愿”——但是,“咨询小组中有多少人真正意识到自己所签下的是一份颇为激进的共和主义方案呢?”^[30]此外,在回忆课程名称从“政治教育”到“公民教育”的转变时,他还曾幽默地把这一转变描述为落实政治教育所做出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妥协和技巧^[31],也可见其侧重点所在。

(三)英国公民课改革的意识形态背景之三:社群主义与社会资本

科瑞克在晚年对于个体品格和社区参与的重视也使其能够与社群主义者进行合作,而这是在政治学界之外、参与推动公民课法定化的另一支核心力量——主要以相关政府官员和社会团体组负责人为主。和我国国内现有研究所引介的一样,英国国

内也长期把公民课法定化的推动力主要归于以科瑞克为代表的政治学理论家们。但是,班·基斯比(Ben Kisby)在2012年出版了《工党与公民教育:政策网络与公民课的引入》(*The Labor Party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Policy Network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Citizenship Lessons in Schools*)一书^[32],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挑战。该书通过对课改前后主要文件的梳理,以及对课改核心参与者的直接访谈,重新回顾了这一过程,得出的结论是:科瑞克等政治学家虽然在课程法定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课改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与其他意识形态和政治理论认同者的合作。后者推进课改的主要理论依据与科瑞克不同,核心是布坎南的社会资本理论——他们是由于担忧英国社会资本(社会网络所培育的社会信任)下降而推动课改的。而且,虽然科瑞克强调公民课与“政治教育”的连续性,但是就课程方案设计和具体落实而言,二者存在明显断裂。

科瑞克晚年也意识到了其强调“参与”的政治教育的挑战和风险。2007年,在其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中,他直接指出,回顾自2002年开始的公民课实践,道德责任和社区参与这两项内容通过志愿者活动得到了较好落实,政治素养的第一项内容(有关政治概念和政治过程的知识)也以传统教学方式继续进行着,但是,政治素养的第二项内容(积极政治参与的意愿和能力)在实践中却几乎被淡忘了,^[33]对公民课改革所进行的长达10年的评估也在课程效果方面得出了类似结论。^[34]而2014年9月开始实施的新课程方案则把内容修改为四个部分:原方案的社会与道德责任和社区参与这两项被综合为“志愿精神”,新增“法律知识”和“财务技能”两项内容,“政治素养”得到了保留,但是其含义被修订为“关于英国政治治理、政治制度和政治参与的知识 and 理解力”^[35],取消了“政治参与的意愿”这一用词,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对积极政治参与的强调。

确实,回头看,公民课课改仿佛是科瑞克用行动对其政治学理论(“妥协和调解”)的最佳阐释。在英国浓厚的保守主义氛围之下,这一妥协对于课程的法定化功不可没,但是,该调解可能也使得英国公民课成为多元主义、社会主义、共和主义、社群主义等多个意识形态的混合体,从而在内容上呈现出混杂多元的特征,给教学实践和操作带来困难。

三、结语

保罗·卡恩(Paul, W. Kahn)先生在《摆正自由主义的位置》(*Putting Liberalism in Its Place*)一书中指出,民主政治的良好运转不仅需要政府官员对他们所承担的责任负责,也更需要所有政治参与者的能力和美德,需要协商的精神,需要共同的知识、共同的理解、相互的信任,需要彼此承担责任;民主社会的持续,归根结底依赖于有利于民主的心灵和思维方式在后代能否持续下去,也正是因为民主的社会条件如此重要,民主制度有可能遭遇到的危险,很大程度上也就在于这种有利于民主的社会条件的

丧失,这也是民主的脆弱性所在。^[36]曾经把竞争性代议制民主作为“历史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在对现代民主的最新演化的观察反思后得出,在缺乏信任和现代国家的社会里推行民主,腐败就会随之而来,无孔不入的依附主义会侵蚀掉民主的所有益处。只是为了“利益妥协”而没有“对话与共识”的民主,与良治可能存在天然的紧张关系。^[37]

确实,自柏拉图所嘲讽的“无知的统治”、到托克维尔惊呼的“多数暴政”、再到正在影响当代世界政治的“民粹主义”,我们是否处在柏拉图所批判的世界里?然而,即使我们处在柏拉图所描述的陷阱里,现代人类社会也不再能沿着他给出的方向走出去——我们已无法接受“哲学王”的潜在前提:政治权利与参与机会的不平等。给定对平等的内在价值的认同,我们就必须直接面对政治权利和政治参与的困境:如何在尊重每个个体表达、影响公共生活的权利的同时,让审慎的知识和善意的美德作为决策依据?或者说,如何平衡“平等”和“能力”?而政治教育给出的出路是:提高每个人的能力。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当代世界各国都开始关注政治教育——虽然,在不同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下,政治教育被内涵于公民教育、品格教育、价值教育等多样化的形式之中。

然而,从英国政治学界围绕“政治教育”的讨论中、从其课程法定化过程里名称和内容的转变中,我们也看到政治教育在当代社会所面临的难题。其一,由于多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学理论就人类政治生活,以及教育在其中的地位等很多基本问题的看法存有冲突,所以,对政治教育的价值、过程、乃至其名称都存有多元认识,这就为政治教育的现实设计和实施带来了难题。其二,就像英国公民课课改中所呈现的那样,我们依然没有找到切实有效的培育“积极参与能力及其意愿”的方式,难处可能在于:在参与者不具备作出良好政治判断的能力的时候,让其作出重大的政治决策是有风险的;但是同时,除非面临、甚至真正参与重大的政治决策,民众也缺乏培育自身作出良好政治判断的能力的激励。这两点结合起来看,可以说,在通过细致的学术研究来清理有关基本理论问题的同时,平衡好操作实施的跷跷板,可能是英国公民课课改给我们最大的启发。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离不开高质量的政治教育。在借鉴和反思其他国家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全球化视野下中国传统和当代国情的特殊性,思考和摸索适合中国的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话题。

[参考文献]

[1] 吴海荣. 教育分权下英国学校公民教育的课程差异与困境[J]. 外国教育研究, 2014, (7): 98-108.

[2] Digital Education Resource Archive (DERA). Education for Citizenship and the Teaching of Democracy in Schools[EB/OL]. [2018-12-31]. <https://dera.ioe.ac.uk/4385>.

- [3] Aristotle. Politics[M]. Translated by Ernest Barke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2: 51.
- [4] Crick, Bernard. Defense of Politic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15.
- [5] Crick, Bernard, Tom Crick. What Is Politics?[M]. London: Hodder Arnold, 1987: 1.
- [6][23] Bernard Crick. Democrac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93.
- [7] Bernard Crick, A. Porter.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olitical Literacy[M].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Press, 1978: 6.
- [8] Wringe, Colin. Democracy, Schooling and Political Education[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4: 95-100.
- [9][18] Oakeshott, Michael. Political Education: an Inaugural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M]. Cambridge: Bowes & Bowes, 1951: 7-28.
- [10][16] Bronnhill, Robert, Patrician Smart. Political Education[M]. London: Routledge, 1989: 1-15.
- [11] Education in England. History Documents Articles. The Spens Report[EB/OL]. [2018-12-31]. <http://www.educationengland.org.uk/documents/spens/spens1938.html>.
- [12] Education in England. History Documents Articles. The Norwood Report[EB/OL]. [2018-12-31]. <http://www.educationengland.org.uk/documents/norwood/norwood1943.html>.
- [13][25][30][33] Crick, Bernard. Citizenship: The Political and the Democratic[J].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2007, (3): 235-248.
- [14] Entwistle, Harol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a Democracy[M]. London: Routledge, 1971: 1-10.
- [15] Euben, Peter. Corrupting the Youth: Political Education, Democratic Culture, and Political Theory[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231-265.
- [17] Walzer, Michael.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and Political Education[M] // Melvin Richter (Eds.). 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159-176.
- [19] Brennan, Tom.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Democrac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3-42.
- [20] Solly, Henry. Party Politics and Political Education[M]. London: E. Stanford, 55, Charing Cross, S.W., 1879: 4-23.
- [21] Whale, George. A Fragment on Political Education[M]. London: William Ridgway 169 Piccadilly W, 1882: 1-57.
- [22] Callan, Eamonn. Creating Citizens: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Liberal Democracy[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1-11.
- [24] Crick, Bernard. Socialism[M].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1-42.
- [26] Crick, Bernard. Civic Republicanism and Citizenship: the Challenge for Today[M] // Bernard Crick, Andrew Lockyer (Eds.). Active Citizenship: What Could it Achieve and How?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0: 15-35.
- [27][28]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Republicanism[EB/OL]. [2018-12-31].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republicanism>.
- [29] Peterson, Andrew. Civic Republicanism and Civic Education: The Education of Citizen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1-5.

[31] Crick, Bernard. Education for Citizenship: The Citizenship Order [J]. Parliamentary Affairs, 2002, (55): 488-504.

[32] Kisby, Ben. The Labour Party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Policy Network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Citizenship Lessons in Schools [M].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2: 1-15.

[34] GOV of UK. Research and Analysis.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England 2001-2010 [EB/OL]. [2018-12-31].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itizenship-education-in-england-2001-2010-young-peoples-practices-and-prospects-for-the-future-the-eighth-and-final-report-from-the-citizenship-e>.

[35] GOV of UK.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Statutory guidance) National Curriculum in England: Citizenship Programmes of Study for Key Stages 3-4 [EB/OL]. [2018-12-31].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national-curriculum-in-england-citizenship-programmes-of-study/national-curriculum-in-england-citizenship-programmes-of-study-for-key-stages-3-and-4>.

[36] [美] 保罗·卡恩. 摆正自由主义的位置 [M]. 田力, 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 156.

[37] [美] 弗朗西斯·福山. 政治秩序的起源: 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M]. 毛俊杰, 译. 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339.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Ideological Background of The Citizenship Curriculum Reform in England

CHEN Lin

(School of Marx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Citizenship became part of the compulsory courses of secondary schools in England in 2002. The guideline was revised in 2014. Fierce academic debates shaped the curriculum reform. Political theory of political conflict media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ve equalit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legalization of Citizenship education. The wide acceptance of social capital theory also helps to win the necessary support. The current curriculum is a mixture of various ideologies such as socialism, republicanism and communitarianism. This multi-feature provides both pragmatic conditions for the curriculum's legalization and challenges for its implementation.

Key Words: England; Citizenship;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Ideological Background

[责任编辑: 立 茹]